心·观念

寻常生活的文化味道

□ 张 坤

油盐酱醋茶，厨火烟气熏，寻常生活的磕磕绊绊、习惯习俗，已经深深浸润在我们的血脉和文化的味道里了。

因当年“5·12”地震后，家园重建时受到吴老师的帮助，四川省绵阳市的一位农民寄出亲手做的“酱鸭年货”表达谢意。“寄来的腊肠和酱鸭被挂在了阳台上，又重又‘丑’，却让人心生温暖。”吴老师这样写道。

这份温暖的匠心、感恩心，正是寻常生活中“最好的关系”“最好的礼物”。从形同陌路到心心相印，哪怕是夫妻姻缘，也靠着寻常生活联结交融、添信增爱。

“最好的夫妻关系应该什么样？”

“钱真的是最重要的东西吗？”

“最好的夫妻关系就一句话，为何看哭百万人？”

“老伴是最好的另一条腿，为啥谁也离不开谁？”……

不久前，一个关于寻常夫妻关系的系列短视频栏目，居然冲上热搜，引发上亿人关注！

“最好的夫妻关系就是：你懂他的辛苦，她懂你的付出”“夫妻不是敌人，不要想着征服、压制对方”“不要吵赢了架，却输了感情”，这些质朴的观点，不仅引发了中老年人的强烈共鸣，也使得很多一言不合就翻脸、视“夫妻家庭”要么如地狱要么如天堂的年轻人感慨万千。

寻常人家、寻常情谊、寻常生活的文化味道，恰恰是当下我们最需要的一种精神滋养，因为其中有每一个人都在意的那份“真实朴实”和“真诚纯真”。某些喧嚣浮躁、隔阂冷漠的氛围，甚至比疫情本身更令人窒息忧郁。

拥有寻常生活的文化味，或许正是电视剧《山海情》能够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吧。电视剧中的人物“得宝”“麦苗”，他们逃离大山，准备外出打工的时候，在山上追逐，那快乐、单纯、明亮的青春欢笑声，在旷野山谷中久久回荡。这充满浓浓寻常生活味的场景，让观众久久难忘。

是的，最不寻常的文化，恰恰来自最寻常的生活，来自生活与生活的摩擦和交融，如此才能起到文化日用而不觉的作用。

处在任何生活的逆境挫折中，都不能放弃希望。我们以一片向上向善的诚心，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磁力场里转动，便能产生文化的电流，放光发热，传能发力。

任何寻常的生活中，都能发现、发掘文化的不同寻常。可以说，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单位是文化的园地，社会是文化的土壤。亲情、友情、爱情、对自然之情、对生活之情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催放文化光芒的活细胞、好酵母、优动能。

任何现实的生活，都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文化桥梁。文化所要记录传达、发展改变的思想，乃是人类生活中心的思想。文化脱离了现实鲜活的生活，就成了不可思议的古董。

100年前，那个叫陈独秀的年轻人，总是以“记者”的署名，在《新青年》上发表对寻常生活的感悟和洞见。在今天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的新时代，生活也在选择着“记者”，而真正能扛起“记者”名号的，需要研究寻常生活中的文化味道，理解把握关于生活与文化“最好的关系”。

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生活形式”概念，我们需要文化成为一种生活习惯，需要充满文化味道的生活。生活是树，丰富了文化；文化是根，托举了生活。文化多滋养，生活才多彩。

一个真正有文化的“记者”，不能离开寻常生活、寻常人家，不要辜负这个新时代。

这温暖的

暖 心

“我不是笨小孩”

爱和接纳是最好的解药

郭怀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从出生到上学前，校校一直都是个完美的‘别人家的孩子’：不哭不闹、4个月开始睡整觉、不挑食、不爱生病，打针摔跟头都不哭，语言表达能力强，会主动和人打招呼，开朗活泼的小脸上总是笑呵呵的……

校校的上学成了全家命运的转折。一年级时，校校开始表现出好动、注意力不集中、写字慢等问题，查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三年级时问题更严重了，写作文憋一上午写不出20个字，被确诊为儿童阅读障碍症。至此，关于校校学习上的各种问题才有了答案。

“在适龄儿童中，大约5%-8%的孩子有阅读障碍的困难。他们常常被误认为笨或者懒。”近日登录观看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第一个镜头就抛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片中，和校校一样被诊断为儿童阅读障碍症的孩子还有群晓和若汐，随着步入学校开始读书认字，这3个家庭在每天的苦恼、困惑和冲突中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因为偶然结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李虹老师和舒华老师，《我不是笨小孩》的导演李瑞华和樊启鹏第一次知道阅读障碍，“保守估计，我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受到阅读障碍症的困扰，然而大众对于儿童阅读障碍症的概念，以及如何帮助这一群体却知之甚少，导致罹患这种疾病的孩子经常因为成绩差而被误解、被歧视”。

3年跟拍的过程并不容易，家庭的焦灼彷徨以及孩子们的拒绝有时会成为纪录片真实记录的一种障碍，然而带着真诚去了解、带着情感去拍摄，让李瑞华和樊启鹏与3个家庭、3个孩子越走越近。

写‘圆’字，校校总是先画一个圆圈，再填上里面的内容，没有笔画和顺序的关系。校校良好的智力并没有体现在学习成绩上，从一年级开始考试成绩一直垫底。

“我看书的时候特别累，那些字都是一闪一闪的，一会儿白，一会儿黑。”校校的阅读体验常人难以理解。被确诊阅读障碍后，妈妈抱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信念艰难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且全家进入“战斗状态”。

因为识字写字方面的困难，校校的一二年级基本上没有娱乐时间。别的孩子在学校就已经写完了作业，他只能回家继续写，其他孩子一小时内就能完成，校校需要三四小时，每天晚上都要写到10点多，有时要写到夜里12点，有一次竟然坐在马桶上睡着了。

家庭矛盾、厌学情绪、挫败感笼罩着这个家庭。

“孩子学习痛苦，我们教他也很痛苦，最痛苦的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不知道阅读障碍的时候，群晓妈妈总在想，这不是我们孩子，写个字都那么困难，“觉得他笨，笨死了，所以经常也这么说他”。

一年级在跟同龄孩子做横向对比的时候，妈妈发现群晓有很多字都不认识，每次读书，要么不认识字，要么读着读着就串行了。群晓的班主任也发现，“反复教他字，他是学不会的，偏旁部首分开老远老远的，看不出来是一个字，人、大、天这样特别简单的字，他都写不对。哪怕是抄字帖，不该出头的出头，该出头的不出头”。

每次记生字的时候，群晓都痛苦万分，经常用笔在手上胳膊上写，用手在墙上抠出一个又一个洞。后来父母想办法像讲故事一样教他认字，有的他能记住，有的上个厕所回来就忘了，非常沮丧，“不在他那个位置，你理解不了他的痛苦。别人看一眼就记得住，我为什么得记四五十遍？他不能放过自己，我们怎么劝也没有用”。

已经考上重点中学的姐姐从小到大都是学霸，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在家里堆得满满当当，可是尽管若汐很努力，小学一年级起语文就没及格过。每晚的作业都在一点点消磨着爸妈的耐心，还有她的意志力，“就是特别想下笔就写不出来，这动动那动动地待不住，我妈就很着急，问我能不能不动了，我说我控制不住，她就说忍着”。妈妈辅导作业时不时会上演撕卷子的‘动作片’，爸爸值班时，若兮写作业更费劲了，“10分钟都累得慌”，不管爸爸怎么软硬兼施，她都是那句‘我现在不想写’。

因为识字困难，语文成绩很差；因为读不懂题，数学成绩不好，因为记不住字母的顺序，英语成绩也上不来。怎么努力也上不去的成绩，成了这些孩子童年里的噩梦。

阅读障碍，也叫失读症，是发展性读写困难的别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李虹老师说，如果给阅读障碍一个通俗的定义，就是指智力正常、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是由于先天的一些大脑功能轻微失调，使他们不能正常地快乐地学会阅读。

“成人很多时候很难理解，怎么教都教不会，好像他的记忆力这儿有个膜似的，进不去。”为了让校校能专注写作业，全家人都得轮岗上阵，姥姥也不例外。三四年级开始，校校学会偷懒了，抓紧在学校的所有时间玩，因为他知道回家无处可逃，数不清的作业在等着他。

“妈妈着火了！"哪里？"你头上。”一到要写作业的时候，一万件事都来了。接受李虹老师的建议，妈妈‘温柔而坚定’地陪校校，可是每次熬到深夜，再拿起几乎不敢看的作业时，她怎么也温柔不下去了。“那你能小声点吗，你喊就有用了吗？"我有病啊，你有药吗？”五年级，校校开始叛逆了，喜欢挑战妈妈的权威，经常让火冒三丈的妈妈哭笑不得。

和若汐、校校磨磨蹭蹭抗拒作业不同，群晓对于写作业总是有着极强的自律性，从来不用督促。在班里，群晓各方面都属于中等偏上，可每次考试后他都会跑去问老师，他是不是最低分，这种看不见的‘负能量’群晓自己也能感受得到，可他就是忍不住把这种压力扩大很多倍。

舒华老师第一眼看见群晓，就感觉他不是一个特别高兴的孩子，他总是低着头，然后手放在桌子上，在那抠着手，嘟着嘴，情绪很不好，“我第二次反馈给他结果的时候，我说你比同班80%的同学都聪明，他说不可能，我很笨的。其实他内心里还是特别的不自信”。

群晓敏感、自我要求很高，可因为成绩差，同学甚至会当着父母的面欺负他。“我都不想回忆那段往事，只不过是个模糊的阴影。”群晓躺在飘窗上，用毛毯遮着眼睛。

“我要找一个对他友善的环境，不止是老师和孩子们对他友善，而且这个环境不会因为他的成绩这一个标准来评判他。”为了守护群晓的心理健康，父母选择了山西的一所学校，妈妈过去陪读，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双城生活，“害怕他受以前记忆的干扰，连名字都给他改了，就想给他一个全新的生活。”

因为不堪忍受误解造成的伤害，若兮妈妈也给她转过一次学。“有一天我中午回家，发现本来活蹦乱跳的孩子在沙发上躺着，特别落寞地睡着了。原来老师把她叫到讲台上批评她，导火索是小测验成绩太差，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把你开除了。孩子吓着了，下午开始发烧，就不敢上学校去了。”

开心果一样的校校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懂他的班主任，可是因为成绩老在班级里垫底，同样躲不开来自同学的‘语言暴力’。虽然他从来不说，妈妈知道，这些他都自己承受了。

“上帝在你的脑子里关了一扇门，那肯定就会给你开一扇窗。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长大以后有一项特长，只不过我现在不知道而已。”已经升入初一的校校依旧充满存在感，调皮捣蛋却开朗自信。妈妈也坦言不担心他的未来，“我知道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用他的长处依然能在社会上好好生存。我过不去的是现在，熬不过去现在这一次一次的作业和一次一次的考试”。

2019年，若汐期末语文成绩考到78.5分，父母为她制作了奖状。若汐是片中3个孩子里最小的，一开始怎么拍都不满意，感觉这个孩子没‘出来’。李瑞华说，为了真正了解她的内心，我们必须等她长大，等她升入六年级，认知表达能力上来了，终于可以把压在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清晰地描述出来，所以才有了她的那句‘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可能有的时候，人也会不完美’。

曾经，对群晓而言，自由阅读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现在他的阅读速度已经跟同龄人差不多了，喜欢看传记、历史、武侠小说，甚至能啃下《史蒂夫·乔布斯传》这样的大部头。可爸爸的担心并没有放下：“表面上看他突破了阅读，但实际上在应试方面他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短板，你就知道他会受挫折。”

樊启鹏说，和自闭症相比，国内关于阅读障碍的研究开始较晚，大众媒介对阅读障碍的关注很少，甚至连很多精神科医生都不知道，“目前国内并无针对阅读障碍的全国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权威的诊断机构，特殊教育系统也不覆盖他们，导致这些孩子缺乏来自教育系统和医学系统的支持”。

作为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家庭教育阵地的重要守护者，也是为孩子‘托底’的人。让樊启鹏感动的是，面对孩子的与众不同，3个家庭的父母勇于接受事实：校校妈妈在社交中从不回避校校的问题，坚持组织各种各样的家庭小聚会，给孩子创造更多和小伙伴交往的机会；群晓妈妈为了找到一所能接纳群晓的学校，放弃自己的工作，一个人到山西陪读；若汐妈妈因为孩子的问题压力过大，得了免疫系统疾病，仍然坚持每天早上陪若汐记单词。

现实远比镜头中呈现的更为痛心，李瑞华和樊启鹏坦言想做阳光、温暖的，给人带来希望的力量，每一集里的孩子都有成长。同时，家长拥有着有强大的能量，“虽然他们所经历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他们所呈现出的坚韧压过了悲情”。

片子播出后，团队接收到大量正面的反馈，但他们知道，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真正了解阅读障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社会、媒体对阅读障碍的误解还比较普遍，不回避、不隐瞒只是前提，接下来还需要理性、科学地对待问题，用正确的途径帮助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

李虹透露，《我不是笨小孩》同名个案集正在计划出版，“如果说纪录片主要解决了阅读障碍症‘是什么（描述）’‘为什么（解释）’的问题，我希望书稿能在一定程度提供一些‘怎么样（预测）’‘怎么办（控制）’的思考与建议”。

“或许纪录片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是片中父母的行动以及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生动阐释了爱和接纳是最好的解药。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是这些孩子成长的第一步。”李虹说，阅读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就像骑自行车或者学开车一样，只有在做中学，才会熟能生巧，“达·芬奇、爱迪生、爱因斯坦、乔布斯等名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阅读障碍，但并不影响他们改变世界”。

The Chosen One，是主创团队为《我不是笨小孩》所选择的英文译名，意为“天之骄子”。当现代化的要求是统一和标准，该用什么视角和态度去看待个体生命的不同？李瑞华的答案是：相信种子，相信岁月。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被上天选中的孩子，不同只是暂时的，他们都拥有光明的未来。

扫一扫 看视频

图片新

2月22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某互联网企业总部大楼内，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员在临时改造的留观室内休息观察。为了让接种更加集约高效，海淀区成立31支上门接种队伍，针对人数较多并且有合适场地的单位，如高校、科技园区等场所设置内部临时接种点，开展上门接种服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 曹 林

不算多大的一条新闻，街头很寻常的一个场景，深深打动了我。

前段时间杭州一条人行道上，一名产妇突然临盆，司机、路人、附近小区的保安和物业，不少人跑来帮忙，拿着衣服围成了个小圈，形成了一个临时产房。不少闻讯赶来的业主也纷纷带着毛毯、衣服、纸巾等前来帮忙，一边有人一直在给120打电话。参与救援的物业胡师傅后来受访时说：我连她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都不知道，不过听见孩子的哭声洪亮，应该蛮健康的。产妇被送上救护车的那一刻，我都快哭出来了，比我孙子出生还激动啊。

都市报的版面上经常看到类似新闻，不同城市都有，普通得都很难成为新闻了。正因为平常，都是普通人，才更让人感动。这个善良的凡人群像，日常街头的一个瞬间，用众人的背影搭起的临时产房，在道德上很有象征意义，传递着一个社会最普通的人对陌生人的善意。

我特别注意到了这条新闻中那些人的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参与其中，司机、保安、邻居、业主、物业师傅、外卖小哥、路人。这些职业和身份，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可能都不是太注意，基本上属于“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生活中经常打交道，陌生，是因为大多只是看作一个符号和生活背景，并没有说过几句话，只是在打车、叫外卖、开门、维修时才会有几句交流。这些身份，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最普通的人，最平常的日常生活背景。

但关键时候，正是这些最普通的人伸出援手，在街头保护新生命的到来，保护孕妇的安全。他们不是媒介形象中通常意义上那种“英雄”，没有什么非凡的能力和特别的奉献，不需要冒多大风险和危险，上升不到“挺身而出”“从天而降”“舍己为人”的高度，不过是普通的举手之劳。正是这种普通，才更让人安心，因为我们日常遇到最多的，就是这些普通人。没有多少从天而降的英雄，多是挺身而出的凡人，普通人的善良，平凡人的援手，街头流动的群像，代表着一个社会常态的道德水平。我们生活中遇到最多的就是这些路人，而不是警察和医生，所以路人的道德水平跟我们关系最大。

这些普通的职业，熟悉的陌生人，都有着自己的生计，这些举手之劳的善良，与他们的日常生计都没什么关系，纯粹人之为人、助人救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尤其可贵，社会分工把我们分割成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渐渐形成机器人般的职业性冷漠，对职业程序之外的事务毫不关心，困在那个系统中，送餐的只想着不能延时被扣钱，保安只想着在岗上不出事，司机只关心到站收钱，业主关上门外面的世界就跟自己无关。这个温暖的群像告诉我们，人的善良与职业无关，是保安、修理工、司机、外卖人、陌生人，首先更是一个有着怜悯、共情、爱和善良能力的人。

这条新闻中，不同职业的人作为一个“临时产房”群像，凝聚着一个社会的日常道德生态网络。提到路人，人们常常想起的标签是“冷漠的路人”，生活中可能确实会有冷漠现象，但这样的新闻告诉我们，在我们身边，善良比冷漠更强大，普通人的善良，有着更广阔的群众基础。

我们彼此是路人，作为生活背景的路人，弥漫在我们身边，善良需要去发掘、呵护和激发。特别是要善待我们身边那些普通人，那些熟悉的陌生人。善良在人们身上、人们心中是互相传递的，一个受到善良对待的司机，会把这种善良传递给乘客；一个受到善良对待的邻居，会把这种善良传给另一个邻居、另一个陌生人。我们都要成为这种善良的生产者，而不只是消费者，不只是消费别人对你的善良，而要付出善良，一个社会普通人的道德水平，就是这样点滴生产中累积起来的。

孝心不减当年 生活迈向‘新高’

安徽肥西‘美德少年’程保留全家过上幸福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春节期间，将满20岁的程保留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而他的经历正如歌中所唱：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2014年，程保留获得全国“美德少年”称号。7年过去，他依然用孝心、爱心做母亲的“拐杖”和“眼睛”。随着脱贫攻坚持续深入，程保留一家享受到健康脱贫、教育脱贫、产业脱贫政策，生活得到保障，日子越过越好。

程保留家里有3口人，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程红贵腿部残疾，属弱劳动力，母亲刘玉年双目失明，丧失劳动力。父亲平时做泥瓦匠，早出晚归，全年无休。12岁起，程保留就独自照顾母亲，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包揽洗衣、做饭等家务。

那时，程保留还没有锅台高，站在小板凳上洗碗。在妈妈的指导下，他渐渐承担起一日三餐。有一次，家里没米了。刘玉年觉得儿子年纪太小，不让他去买。程保留却说，“50斤的米我搬不动，买20斤的，总可以。”他找亲戚借了一辆自行车，从镇上驮回一袋大米。

懂事的程保留很少吃零食，也从不买玩具，他知道父亲挣钱不易，能省一些是一些。

高考结束的暑假，他到汽车厂做兼职，包扎汽车底盘线。2个月后，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买新衣服。

合肥市肥西县陶店社区扶贫专干倪春华记得第一次去程保留家走访时的场景：破旧的木制桌椅和木板床，是这个家庭的所有家具。昏暗的厨房里，儿子帮妈妈洗菜、淘米。倪春华介绍，除了参与“雨露计划”培训、享受校内外教育资助，社区还帮他申请了4000元大学生困难补助。

近年来，程保留家每年能收到资产收益入股分红、土地流转租金，平时还有低保残补作为兜底，享受综合医疗保障和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程红贵依然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去镇上打零工。目前，全家人均年收入有1万多元，顺利脱贫。

如今，程保留是安徽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大二学生。他在学校食堂的勤工俭学岗位工作，每个月有五六百元收入，不需要向家里要生活费。

随着肥西县花岗镇整村推进工程的实施，程保留家的房屋被拆迁，目前租住在一处民房，租房期间享受每人每月400多元的补贴。他们计划元宵节后搬进新租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这是一家人头一次住上楼房。程保留家所分到的安置房也正在规划建设中。

在校期间，程保留最挂念的是独自在家的刘玉年，妈妈眼睛看不见，无法用微信、短信联系。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免费为他家安装了宽带和设备，并赠送了一台5G手机。程保留能通过摄像头实时看到刘玉年在家中的状况。母亲想儿子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眼睛”喊话，程保留的手机App就会收到提醒消息。

程保留期待毕业后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能为社会多作贡献，也能早日成为家中的一棵“大树”，为父母挡风遮雨。